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 4 期
2003 年 6 月，頁 129～158
本文 2003.5.15 收稿，2003.6.10 通過刊登

近代中國外交官與日本文人的思想及典籍交流

徐興慶*

三代名臣暨漢唐，
殿屏圖列古冠裳。
維新孰建東遷策，
頓改官家舊日裝。
何如璋**(1838-1891)

摘　要

本文以 1877 年晚清的駐日公使館開館之後爲時代背景，探討何如璋、黎世昌、楊守敬等晚清駐日外交官在日考察之內容與得失。他們都有以下的共同點，一爲三人都是接受中國傳統儒教文化教育的晚清官僚，二是三人皆爲晚清對日外交的前鋒人員、官方代表。他們也是明治初期第一批踏入日本，調查或見證過日本政治、社會近代化的諸相，同時也是直接與日本知識分子交流的日本研究集團。本文藉《使東述略》、《日本訪書志》等相關文獻，分析近代中日兩國人物在思想交流上的異同現象，同時也藉由學界很少利用的《清客筆談》，論述楊守敬將失佚已久的古籍珍本從近代日本回流中國的典籍交流之歷史意義。

關鍵詞：何如璋、黎世昌、楊守敬、《使東述略》、《日本訪書志》、《清客筆談》

* 國立臺灣大學日文系副教授
** 引自何如璋（1838－1891）《使東雜咏》第三十六首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Diplomats and Japanese Scholars of Modern Times—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and Ancient Works

Shyu, Shing-ching*

Abstract

As we know, the Ching Dynasty founded its Embassy in Japan in 1877. In this paper, we are going to make a survey of the accomplishments and the gains and the losses of Ru-Zhang He, Shi-Chang Li and Shou-Jing Yang, the ministers accredited to Japan. We try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ideas and philosoph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ith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data--Shi Dong Shu Lue and Ri Ben Fang Shu Zhi. In the meantime, using the book Qing Ke Bi Tan,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Yang's bringing back to China the missing ancient books and rare editions.

Key words: Ru-Zhang He, Shi-Chang Li, Shou-Jing Yang, Shi Dong Shu Lue, Ri Ben Fang Shu Zhi, Qing Ke Bi T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近代中國の外交官と日本文人の思想及び典籍交流

徐興慶*

要　旨

本稿は 1877 年の清国末期に東京に駐日公使館が開館されたあとの時代背景として、何如璋、黎世昌、楊守敬ら清国の初期の駐日外交官が日本での視察に関わる内容及びその得失を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彼らは以下の共通点を有している。一つは、三人とも中国の伝統のある儒教文化の教育を受けた人物である。もう一つは、三人とも清国末期に派遣された初期の駐日外交官である。また、彼らは明治初期において、初めて日本に入国し、日本の政治、社会の近代化の諸相を調査、かつそれを経験した清国政府の代表者であると同時に、直接に日本の文人たちと交流した日本研究のグループである。

本稿は《使東述略》、《日本訪書志》などの関連資料に拠りながら、近代中日両国の人物が交わした思想的な差異現象を分析したほか、今まで中日の学界にあまり利用されていないオリジナル資料の《清客筆談》によって、楊守敬が、すでに散逸した善本古籍を日本から中国に持ち帰った両国の典籍交流における歴史的な意義を述べた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何如璋、黎世昌、楊守敬、《使東述略》、《日本訪書志》《清客筆談》

* 台湾大学日本語文学系助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代中國外交官與日本文人的思想及典籍交流

徐興慶

一、前言

日本德川幕末，在美國艦隊司令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於 1853 年 7 月及 1854 年 2 月，兩次率「黑船」叩關日本江戶後，二百多年的幕府鎖國體制終告瓦解。日本門戶開放的結果，首先面臨的是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及通商章程。1868 年明治政府的成立，揭開了日本近代史的序幕。日本深怕步晚清[1]的後塵，成爲列強在亞洲的第二個殖民地，遂在 1871 年提議與中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表面上尋求「中日聯盟」以對抗歐美列強，實際上是以去除不平等條約爲國之急務。[2] 其目的還是鎖定在中國的利益。1873 年 4 月「中日修好條規」批准換約之後，晚清與日本才正式有國交關係。在整個明治維新的近代化過程中，日本直接與外國接觸的機會增加，逐漸脫離了傳統的亞洲而向文明的歐洲靠攏。反觀晚清到 1861 年才成立「總理外國事務衙門」處理對外事務，在一連串的洋務運動之後，從 1870 年以降，開始認知到中國必須與世界的先進、文明接軌才是改革之道。晚清在外國設公使館，派遣中國的官員、知識份子直接接觸歐美以及日本的政治、社會、學問及技術等層面，也是從這個階段開始。爲了達到將海外各國的文明移植到中國的目的，晚清知識份子的海外考察從此蔚爲風潮。

晚清人士赴日考察者，從原先的商人層次提升到朝廷派遣的使

---

1 依照孫廣德對「晚清」的定義爲：從鴉片戰爭（1840）到滿清傾覆（1911）的 70 年間爲止。《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緒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2 1854 年日本被迫與美國簽訂「日美和親條約」（又稱「神奈川條約」），與英國簽訂「日英協定」，1855 年與俄國簽訂「日俄親善條約」，1856 年與荷蘭簽訂「日荷親善條約」，1858 年復與美國簽訂「美日修好通商條約」（又稱「下田追加條約」）。這些都是不平等條約，他迫使日本「開國」通商，喪失關稅協定與治外法權等有損國家經營的重大權力，加速了德川幕府的崩潰。

節，根據實藤惠秀的統計，從 1868 年到 1880 年止，有關晚清知識份子的日本遊歷紀錄多達十五種。[3]甲午戰爭之後，晚清地方政府出資的日本考察人員紛紛出籠，期間也出現了不少自費前往日本遊歷的文人學者。熊達雲甚至於指出這種近代中國官民的日本視察已達氾濫的地步。[4]無可諱言，中國對日本的認知上，以及兩國在文化交流的層次上，又呈現了另一個新的里程碑。這些現象與晚清政府想要對日本做更詳盡的認知有深厚的關聯性。

二、近代中日兩國典籍與思想交流的問題所在

所謂日本向文明的歐洲靠攏，是指它在短時間之內吸收了大量的西洋文化，而漢譯西書的東傳是日本近代化的媒介之一，這與江戶時代日本漢學的興盛有著深厚的關係。增田涉在《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中，曾經明白指出：

>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節節敗退，因而反思自己的缺點，思考自己的抵禦西洋列強之道，其中藉由大量的漢譯書以吸收西洋學術文化，從思想上來改變國家的體質，這就是近代化的方法之一。[5]

日本看出這些西洋的啓蒙書，就是從古典中國到現代中國的體質改革之媒介。日本輸入在中國翻譯完成的西書，加以訓點再翻刻出版與普及，對於改善和啓蒙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國家體質有很深的影響。[6]另

---

[3] 實藤惠秀《明治日支文化交涉》(東京：風光社，1943)，頁 166－167。

[4] 熊達雲《近代中國官民の日本視察》，(山梨學院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叢書 3)，(東京：成文堂，1998)，頁 180。

[5] 增田涉《西學東漸と中國事情》(東京：岩波書店，1979)，頁 4。

[6] 有關晚清中國東傳日本明治社會的漢譯西學書對日本思想界・文化界之影響，也有諸多先行研究。除了前揭增田涉的研究之外，較具代表性的早期研究有中村久四郎〈近世支那の日本文化に及ぼしたる勢力影響〉(一)－(八)，《史學雜誌》第 25 篇 2、3、7、8、10、12 號，1914。第 26 篇 2 號，1915。小澤三郎《幕末明治耶穌教史研究》，亞細亞書房，1944。鮎澤信太郎《鎖国時代の海外知識》財團法人開國百年紀念文化會刊行，1953。中國方面則有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出版社，1987)。彭〔伊原〕澤周《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西洋文化摂取論》，(東京：汲古書院，1999)。又筆者於 2001 年曾到關西大學訪問研究，從該校「增田涉文庫」收集到不少西學書之和刻本，謹此致謝。

外，據《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的統計，到江戶時代爲止，日本翻譯漢籍的種類高達 129 種。[7] 江戶時代在鎖國體制之下，漢籍書就藉由中國船到長崎貿易大量的流入日本。再據王曉秋的統計，從 1840 年到 1855 年爲止，由中國船舶載到日本的書籍就高達 3,407 種，45,481 冊之多，其中漢籍書佔了相當高的比例。[8] 而大庭修對整個江戶時代的漢籍東傳，及其對日本的影響，更是做了非常深入而且詳盡的研究。[9] 對日本而言，基本上先有漢籍東傳，才有所謂的西風東漸，這個理論是可以成立的。明治初期，日本國內的體制一切以西學、洋制爲依規，對於這種徹底排斥儒教傳統的近代化特殊現象，長年接受傳統中國儒教文化薰陶的日本思想家，古籍藏書家們並不能欣然接受。舉例而言，本文所討論的德川幕末至明治初期的日本藏書家・醫生森立之（1807－1885）就曾經向晚清駐日館員楊守敬說：

> （日本）在位之人，洋之非而漢之是，無不知之者。然治國之法皆使洋人主之，工匠之學皆使洋人主之。開礦之學、醫學、算學諸學，然故不得已而為之也，似非心淫于西洋學矣。[10]

森氏所提的「（日本）在位之人，洋之非而漢之是，無不知之者」。或許是他身爲藏書家的保守觀點，但至少他知道日本在全力汲取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傳統的漢學對日本並非一無是處。

另外，王爾敏在《晚清政治思想史論》中，反證了現代中外學者提出「儒家思想是阻滯中國近代化的障礙」之定論。王氏說晚清政治思想的形成，不光是求新而且也有復古，他是以傳統學識爲基礎，並吸收西方新知，融會貫通，而後產生屬於這個時代的新觀念。[11] 王氏的結論提及儒家傳統思想並不構成對外來思想排拒的根本因素，它與

---

[7] 引自鄭彭年《日本中國文化攝取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 218。
[8] 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21。
[9] 詳請參閱大庭修的代表著作。一、《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東西文化研究所，1967）。二、《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93）、三、《漢籍輸入の文化史》，（東京：研文出版，1997）。
[10] 李慶編注《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49。
[11]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代化觀念並不衝突，而晚清的知識份子是以儒家學說爲根據而推衍西方學理後展開近代化的運動。

再舉一例，杜維明在〈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中也提到，在西風東漸的潮流之下，儒教之所以被貶爲一文不值，是因爲他在「富強」的前提之下喪失了利用價值罷了。對於這種不能正視傳統文化的現象，杜氏甚至舉出連胡適之、魯迅都認爲這並非是真正的歐化論者。[12] 因此，下面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1）晚清與明治日本在當時的國內社會及國際外壓下，有許多類同的現象，那麼，東西文化的融合與全盤西化，何者對明治初期的日本社會較有幫助？

（2）對日本而言，一定要放棄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甚至日本自有的傳統思想，全部引進西洋的近代思想才能達到近代化的目的嗎？如此，一時之間對日本的國家體制不會造成衝擊嗎？

（3）對晚清而言，「中體西用」的概念應屬邁向近代化的折衷思想，晚清的士大夫如何看日本的西化社會，而它對中國有何影響？有何幫助？

準此問題意識，本文以 1877 年晚清的駐日公使館開館之後爲時代背景，探討何如璋（1838－1891）、黎世昌（1837－1898）、楊守敬(1839-1915)等晚清駐日外交官在日考察之內容與得失。之所以選擇這三位人物，一是他們都是接受中國傳統儒教文化教育的晚清官僚，二因三人都是晚清對日外交的前鋒人員、官方代表。他們也算是明治初期第一批踏入日本，調查或見證過日本政治、社會近代化的諸相，同時也是直接與日本知識分子交流的日本研究集團。本文藉《使東述略》、《日本訪書志》等相關文獻，分析近代中日兩國人物在思想交流上的異同現象，也藉由學界很少利用的《清客筆談》，論述楊守敬將失佚已久的珍本古籍從近代日本回流中國的典籍交流之歷史意義。

[12] 杜維明《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公司出版社，1992），頁 238－2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何如璋與《使東述略》

晚清與日本交涉多年的「中日修好條規」於 1873 年 4 月批准換約之後，日本隨即派柳原前光（1850-1894）爲駐清公使，但是當時日本連續發生出兵台灣的「台灣事件」、以及 1876 年 2 月強迫韓國簽訂「江華條約」十二條款，要求韓國獨立自主，這些不友善的舉動，爲清朝所不容。又因爲當時日本國內發生「西南之役」，明治政情不穩，導致晚清駐日外交人員的派遣延遲到 1877 年 8 月才成行。期間兩國雖有邦交，但中國的對日外交事務出現了近五年的空窗期。這也顯示晚清未能及時認清日本採取漸進式的外交手段以覬覦中國之危機意識，對當時日本急欲廢除不平等條約，擬與歐美列強齊肩並座，走向國際世界的企圖，知之甚少；只是一味採取忽視、敵視的態度，沒有積極應對，最後蔓延到對日本提出有計劃的「琉球處分」之交涉節節敗退，一發而不可收拾。

1877 年對晚清走向國際世界，吸收西洋新知，甚至認識日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時間點。何如璋就在此時奉派出使日本。何如璋出身廣東，出任駐日公使以前爲翰林院侍講，雖然抱有傳統的思想，但他也是翰林院中少數的洋務派人物。他於 1877 年（光緒 3 年）7 月接受軍機處的敕書與國書，拜辭光緒皇帝。同年 8 月抵天津與李鴻章及當時日本派駐中國的公使森有禮（1847－1889）就兩國的外交事務交談之後，從上海搭「海安號」軍艦赴日，途經長崎、神戶、大阪等地考察，於同年 12 月才抵達東京履新。何如璋向明治天皇呈遞外交國書之後，才駐進日本外務省準備的臨時公使館，開始了三年的對日外交事務。在何如璋的幕僚當中有一位副使張斯桂，一位參贊黃遵憲，都是當時對日外交及文化交流事務上強而有力的助手。張斯桂在 1874 年的「台灣事件」當中，曾經是代表清朝政府到台灣與西鄉從道（1843－1902）交涉的潘霨之隨員，同時他也是爲由中國傳入幕末日本，普及日本人國際法知識的《萬國公法》寫序的人物，他到日本以前，已經頗具知名度，因而他被晚清政府拔擢爲駐日副使。至於參贊黃遵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駐日本約五年期間完成的大作《日本國志》，被喻爲近代中國第一部有系統而深入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13]他在輔佐何如璋對處理朝鮮及琉球歸屬問題的外交獻策上，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黃遵憲到日本不久之後，曾經就他短暫接觸的日本，說出以下他對晚清的看法：

> 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14]

黃遵憲點出了晚清對國際局勢感官的遲鈍，士大夫階層的故步自封，以及中國人對日本認識之不足。這種感慨與無助，即是促使黃遵憲完成《日本國志》的原動力。何如璋與黃遵憲以首任駐日外交人員的身份，扮演了推動中日關係「創業爲艱」的重要角色。有關黃遵憲的部分將另文討論。本節先就何如璋的對日觀做一探討。

何如璋的《使東述略》記述自 1876 年（光緒 2 年）11 月至 1877 年（光緒 3 年）12 月。內容記述他到日本第一年的所見所聞，期間他並做了六十五首七言絕句詩，彙整成《使東雜詠》，兩本書成爲他向北京總理衙門的對日觀感報告，它也是了解當時中國人的日本觀之重要文獻之一。

何如璋赴日之前期望對日本做更多的了解，曾閱讀了江戶後期的知名儒者賴山陽（1780－1832）的相關著作。何如璋說：「山陰有賴子成襄者，通漢學，能文章，歿六十年矣。曾見所著《日本政記》、《日本外史》、《新策》諸書，識議宏博」[15]，又在他的《使東雜詠》第二十七首詩寫到：「使舶遙經安藝國（今廣島），能文卻憶賴山陽，此中

[13] 劉雨珍《日本國志》前言，（王寶平主編，晚清東遊日記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 黃遵憲《日本國志序、三》，收入王寶平主編《晚清東遊日記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 鍾淑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何如璋等：甲午戰爭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湖南：岳麓書社出版，1985），頁 94。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近日刊遺稿，可有風流被一方？」[16]

何如璋在前引的第二十七首詩之後曾贊賞賴山陽的知識豐富，文筆流暢。他說：「余見其所著《日本政記》、《日本外史》及《外史》，文甚雅健」。[17] 何如璋到任之後更關注賴山陽新刊的《山陽遺稿》。

《日本外史》是賴山陽以朱子學的大義名分論爲基礎，花了二十五年之久，於 1827 年（文政十年）以漢文寫成的武家歷史。他因受到父親春水，以及水戶藩的《大日本史》的影響，他評擊擾亂名分論者而贊賞提倡名分論者，因此《日本外史》被定位爲批判幕府而鼓吹尊王論的一本書。也因爲《日本外史》是以日本過去的歷史爲借鏡，來論述日本的未來，強調天皇之外，國民皆應平等，致其思想燃起倒幕的火花，孕育了明治維新的誕生。之後，《日本外史》被幕府老中松平定信（1758－1829）認可，成爲日本全國藩校及「寺小屋」的指定教材。

賴山陽本身並沒有否定幕藩體制的存在，他是對圖具形式的名分而不推行善政的支配者做出批判。換言之，他只是強調體制內的自由精神及庶民切身需求而把制度或理論轉移到應用層面罷了。

至於《日本外史》何時傳到日本，這件事要從日本幕末派遣幕吏到中國考察談起。前言提及的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培理相繼兩次叩關日本之後，德川幕府感受到西方列強的外壓不可忽視，就有考慮與國際世界交往，其中當然考慮到包含是否與中國恢復商務、外交等議題。但由於當時日本國內面臨到前所未有的倒幕內壓，在尊王、攘夷及倒幕運動等各系派閥的交相牽制之下，幕府後續的門戶開放政策作業遲遲無法進行，直到 1862 年（文久二年）才收購了一艘英國籍的商船阿米斯吉號（Armistice），改爲幕府的「千歲丸」官船，派遣了以長州藩志士高杉晉作（1839－1867）爲首的七位藩士前往上海考察，[18]這是近世以來日本幕府正式以官方名義與中國的第一次接觸。繼「千歲丸」

[16] 鍾淑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何如璋等：甲午戰爭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湖南：岳麓書社出版，1985），頁 116－117。
[17] 同注 16，頁 117。
[18] 詳請參閱高杉晉作所寫的《遊清五錄》。田中彰解說《開國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所收，（東京：岩波書店，1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訪問上海之後，幕府於 1864 年（元治元年）又派了一艘「健順丸」前往上海，而《日本外史》就是當時的幕吏山口舉直交給上海道台應寶時的。[19]之後日本各藩還有陸續派遣武士前往上海，《日本政記》、《日本外史》等書就在中國民間開始流傳。

另外，1873 年「中日修好條規」批准書交換之後，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1828－1905）以特任全權大使赴任北京時，日本政府即贈送總理衙門十套《大日本史》，同時贈送當時接待日本外交官員一行的同文館官員孫士達一套《大日本史》，贈送同文館的美國籍教師馬鎮（中國名爲丁韙良）一套《日本外史》。[20] 對晚清而言，這些日本史書的西傳對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它促使晚清的官方及民間的知識份子逐漸產生研究日本的風潮。

《日本外史》於在 1878 年由上海的「讀史堂」翻刻出版，此書的評論者錢子琴在序文中對《日本外史》下了「敘事簡賅，議論通明，褒論微顯，真良史之才，文章矩矱也。」的評語，盛贊爲良史之才。據此，何如璋之所以在《使東述略》、《使東雜詠》中，對《日本外史》有所好評，乃因他早在此書翻刻之際，就已經閱讀過了。

四、從《使東述略》看何如璋的日本認識

何如璋的《使東述略》是以他出仕駐日公使的立場，介紹了當時的日本國情。在地理方面，他介紹日本的疆域與國界，何如璋參訪過長崎之後，知道晚清以前徐繼畬在《瀛環志略》裡把長崎、薩摩（今鹿兒島）及對馬解釋成「日本三島」的說法是以偏蓋全的。何如璋以實際參訪日本的經驗，知道日本有「西海道」（九州）、「南海道」（四國）、「中央一大島」（本州）、「東北一大島」（北海道）。全國四周濱海，大島外，群小島錯雜期間，長三千餘里，廣百里至三百餘里。[21] 而所

[19] 新村出〈元治元年における幕吏の上海視察記〉，《遠西叢考》，（東京：樂浪書院，1953），頁 353－355。

[20] 《日本外交文書》，（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本）第六卷，第六十九號文書附記。

[21] 鍾淑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何如璋等：甲午戰爭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湖南：岳麓書社出版，1985），頁 106－1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謂的「日本三島」即是日本的說法都是踏襲前人依文獻所流傳的日本觀，連晚清的啓蒙思想家魏源在《海國圖志》的〈日本島國錄〉紀錄都信以爲真，可見晚清一般知識分子對日本認識之不足。[22]

在歷史方面，何如璋從日本神武天皇的「創業」，一直到江戶幕末的尊王攘夷以及明治維新的國情、相關的歷史人物都做了概略的介紹。[23]而對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政，何如璋舉了官制、兵制、學校、關稅等做了較爲詳盡的介紹。[24] 其他對於日本的新事物，如鐵道、民居風俗，或與中國相關的唐館、華商問題等都有所涉獵，給晚清人士留下了鮮明深刻的印象。

透過赴日履新的短暫考察，何如璋還將晚清與日本做了對比。他提出中國對外認知落後，故步自封，應該盡速自省改善的問題。他於1877 年(光緒 3 年)農曆 11 月 15 日乘船到橫濱訪問各國軍艦司令官，並登艦參觀之後說：

> 調練法嚴格、艦堅、炮銳，兵士，職工皆各勵其職守，器械常繕修；雖處平時，亦如臨大敵狀。稍亂其階級者無，閑蕩者不見，抗命者更無之。余因竊思：西歐之現狀，如我戰國時代。（中略）年年有媾和、有爭戰。因此，各國講武、設防，備攻守之具，造電信以速其通信；造輪船、火車以便其運漕。全國民協其心，不使有遜於他國。[25]

何如璋在日本看出世界各國對國防、練兵、通信、交通等革新整備的一面。他對晚清的人才儲備，國防整備之不足，憂心說道：

> 回顧我國，因地廣、物阜，有充分之資財；但一旦有事，貪於一時之安，以為海外之爭與我無關，是大錯。事未臨頭之前，當先謂自之道，如養育人才，整備國防、肅正吏道、安定人心；

[22] 薛福成在《日本國志序》中也批評徐繼畬和魏源說：「于西洋絕遠之國尚能志其崖略，獨于日本考證闕如，或稍述之而恍惚疏闊，竟不能稽其世系疆域，猶似古之所謂三神山之可望而不可至也」。

[23] 同注 21，頁 104。

[24] 同注 21，頁 104－105。

[25] 陳固亭譯《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中譯本，(實藤惠秀原著《明治日支文化交涉史》)，(台北：台灣書局，1971) 頁 2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惟今、事不出此，只妄誇自大，坐夫時機，此決非安定國內，制禦四方之道也。[26]

他看清了晚清政府妄誇自大，措失了與世界同進步的良機，這是阻礙晚清改革的原因之一。

又何如璋對日本幕末諸侯群雄倡議尊王攘夷，廢除鎖國制度也提出如下的看法。

> 爾來二十年，強鄰（歐美列強）交逼，大開互市。憂時之士，謂政令乖隔，不足固邦本、禦外侮。倡議尊攘。諸國浮浪，群起而和之，橫行都下，德川氏狼狽失據，武權日微。一二幹濟之材，遂得乘時以制其變，強公室、杜私門、廢封建、改郡縣，舉數百年積弊，次第更而張之，如反手然，又何易也。詎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耶？抑實事之轉移，固自有其會椰？此不可得而知之矣。[27]

何如璋對後人認爲幕末鎖國的做法較拙，而明治維新的全盤西化政策較優的看法持保留的態度，他認爲改革應該是形勢比人強的潮流趨勢。換言之，何如璋與賴山陽的看法較爲接近，他們都沒有否定幕藩體制的存在。

另外，何如璋對明治日本棄中華文化之風，做了如下的表示：

> 日本雖遍處東隅，漢、唐之遺風雖有所傳進，今乃立即棄之。最初，美國來求通通商時，因其歷久鎖國、拒絕之；今則一變，改為學習西洋之優點，禮節與度量衡之末、及日用品飲食之細，全類似於西洋。風潮之所趨，無奈何乎。[28]

何如璋的言下之意是指中國與日本都有一個共同的時代包袱，那就是鎖國、不與外界往來、不察世界之精進，對於開國與市更視爲禁忌。所不同的是日本被迫「開國」而至全盤西化，晚清確仍在觀望，裹足

---

[26] 同注 25。

[27] 鍾淑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何如璋等：甲午戰爭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湖南：岳麓書社出版，1985），頁 104。

[28] 鍾淑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何如璋等：甲午戰爭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湖南：岳麓書社出版，1985），頁 29。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前。他也默認了向西洋學習的這股潮流是晚清應該走的一條路。

最後，何如璋在《使東述略》的結語中說明將對日本國政之得失、國土之要害情形，以及自然與人事之消長等，廣爲比較、研鑽、探其根源，分類其事之後，再資晚清諸賢參考。

五、楊守敬與黎庶昌的日本訪書

漢籍東傳日本，由來已久。至少在公元六世紀，大量漢籍就流入東瀛。日本的文化層面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非常深遠。籐原佐世（？－897）撰寫日本最早的漢籍書目《本朝見在書目錄》，其著錄隋、唐時代的漢籍數量，相當於兩唐志著錄書籍的一半。

從古代至近現代，透過人物的往來、書籍傳撥的媒介以及貿易活動的行爲，每個時代都出現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而漢籍東傳，不但時間長且範圍廣，影響日本文化及學術發展更是弗遠無屆。觀中日學界對這個領域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古代，尤其是是歷經兩百九十餘年遣唐使的文化交流，唐朝文化對日本奈良・平安時代的影響極深，中日學界在這個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以汗牛充棟予以形容。[29]

由於日本貴族、寺院嚴護有法，而漢籍故土卻兵燹不斷，書阨接踵，典籍損毀嚴重，以至許多珍本在國內已無處尋覓。歐陽修在《日本刀歌》中慨嘆：“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嚴令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時隔八個世紀，一位中國學者“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有收羅佚之志”，開創了向日本搜訪佚書之先河。他就是晚清第一代駐日公使館之隨員楊守敬。

楊守敬字惺吾。1862 年（同治元年）中舉人,曾於 1880 年受何如璋之召，以隨員名義赴日，當時他已經 48 歲。先後隨何如璋、黎庶昌兩任公使，任職駐日使館。當時明治維新始起，日本社會吸收西洋新知蔚爲風尚，一般知識人棄古書、漢書如敝屣，又因第二任公使黎庶昌（1837－1898）本身自幼熟讀經史，精於古文，重經世之學，喜愛

[29] 詳請參閱池田溫《唐と日本－古代を考え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藏書，兩人志同道合，就趁著與日本文人交流之便展開了搜書、訪書的工作。黎庶昌出身貴州，曾經是曾國藩的弟子，與張裕釗、吳汝綸、及薛福成等人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黎庶昌的著作爲數不少，但有關他出使日本的奏議《使東奏議》、《使東奏牘》等紀錄大都已失佚。[30]不過，從黎庶昌清刊本《拙尊園叢稿》六卷遺著與他的《黎星使宴集合編》當中，可窺見他與楊守敬在日本搜訪東傳日本的珍本古籍，然後使之回流中國的文化交流實況。

黎庶昌繼何如璋之後出使日本，當時晚清政府仍缺乏對日本正確且深入的了解，在列強壓境的環境之下，對日本的政治、外交決策全由北京主導，黎庶昌身爲一個駐日外交官，確有其難以伸展，用心良苦的一面。黎庶昌曾說：「以文會友，廣結民間善緣，上下相交，始可自立于東瀛，庶幾不辱使命」。[31] 在黎庶昌的《庚寅讌集三編、題襟集》裡也吟詩提到：「大局自關吾輩事，好懷須向素心開」、「求友嚶鳴爭出谷，等閒鷗鷺漫驚猜」[32] 這些都反映了黎庶昌以文會友、關心國事的駐日心境與態度。

黎庶昌以公使職務之便，熱衷於詩文與蒐集古籍活動，在駐日期間總共舉行過九次的「中日文人大會」[33]，與會的雙方人士大多以文、以詩會友，並留下不少的詩集。[34]實藤惠秀依據當時的出席簿，日本文人參加大會的人數，總計高達一百一十九人。[35] 從明治時期漢學興盛，以及促進當時中日文人交會的角度而言，黎庶昌確實發揮了他的長才與貢獻。

跟隨黎庶昌的楊守敬最令後人稱讚的是，他在日本花費近四年時

[30] 王慶成〈黎世昌與日本〉，收入山田辰雄編《日中關係の 150 年－相互依存・競爭・敵對》，（東京：東方書店，1994），頁 43。

[31] 黎煥頤〈一百五十年後看黎世昌〉，《貴州文史叢刊》，1992 年第 3 期。上引黎氏的駐日態度是他向當時駐神戶領事的姪子黎汝謙透漏的。

[32] 黎世昌《庚寅讌集三編、題襟集》，（駐日清使館序刊，1890 年），頁 4、5。

[33] 首次「中日文人大會」是黎世昌在 1882 年到任當年的九九重陽節，於上野公園的「養精軒」舉行，起初每年一次，後來改爲兩次，在春、秋兩季舉行。

[34] 「中日文人大會」的詩文集計有 1883 年的《癸未重九讌集編》、1888 年的《戊子重九讌集編》，1889 年的《己丑讌集續編》，1890 年的《庚寅讌集三編》、《櫻雲臺讌集編》等。

[35] 陳固亭譯《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中譯本，（實藤惠秀原著《明治日支文化交涉史》），（台北：台灣書局，1971）頁 51－58。

國立臺灣大學 期刊資料庫

間廣結日本學者，勤於走訪東京的舊書店及古籍藏書家的書齋，將搜訪尋購的漢籍善本書匯集整理後出版了《日本訪書志》[36]。楊守敬並協助黎庶昌完成《古逸叢書》的刊行。《古逸叢書》是由黎庶昌出資，日本著名刻工木村嘉平刻印，[37] 其中收錄了影唐代鈔本《開元御注孝經》一卷、《玉篇》零本三卷半、《玉燭寶典》十一卷、《漢書》食貨志一卷、《文館詞林》十三卷半。另外有宋刊本《爾雅》三卷、《穀梁傳》十二卷、《史略》六卷、《太平寰宇記補闕》五卷半；[38]元刊本《論語集解》十卷、《楚辭集注》八卷等。共兩百卷，二十六種，大多爲中國散逸的孤本善本。[39]

楊守敬在日本搜書、訪書之所以有如此成果，與他獲得晚清駐日最長的公使黎庶昌的支持有直接的關聯。[40]另外，楊守敬結識了不少日本學者、藏書家，這也促使他在日本的訪書順利的進行。其中較爲關鍵的人物有兩位，一位是文科大學（東京大學前身）教授島田重禮，他曾將日本藏高麗藏本的《一切經音義》一百卷（表第 31）贈予楊守敬，因中國已無此本，讓楊守敬雀躍不已。另一位是醫生，也是考證學家、藏書家森立之（1807－1885）。森立之曾與考證學名家涉江抽齋（1805－1858）共編《經籍訪古志》，此書收編日本六十餘家藏書處的漢籍善本達六百種之多，是當時日本最完善的漢籍書目。楊守敬據《經籍訪古志》所載，按其目錄向森立之逐一探尋、商購。喬衍琯在《日

[36] 《日本訪書志》共十六卷，集書達 231 種，原書無篇目。台北廣文書局以《書目叢編・日本訪書志》上下兩冊於 1956 年初版影印了光緒 23 年的刊本。目前《楊守敬集》第 13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已將原文附註標點出版。

[37] 詳請參閱陳捷〈明治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に関する一考察－楊守敬と彫り師木村嘉平との関係をめぐって〉，《江戸・明治前期の日中文化交流》，（浙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編，東京：農文協出版，2001），頁 87。

[38] 《太平寰宇記補闕》是黎庶昌商洽日本當時的太政大臣三條實美（1837－1891）借出後，再以西法攝影而藏者。王慶成〈黎世昌與日本〉，山田辰雄編《日中關係の 150 年－相互依存・競爭・敵對》，（東京：東方書店，1994），頁 48。

[39] 《古逸叢書》是楊守敬協助黎庶昌將殘存於日本的 26 種善本書影印刊行叢書，內含許多舊抄本，影宋本。1919 年商務印書館也刊行《續古逸叢書》，內容也涵蓋了《宋本杜工部集》、《宋本南華眞經》等貴重典籍的影本。另外，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也曾再影印出版。中華書局也將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善本書以線裝本的形式出版了《古逸叢書三編》，內含《宋本山海經傳》、《宋本金石録》等多種線裝書。

[40] 黎庶昌（1837－1898）曾擔任兩任的駐日公使，首任（第二代）從 1881 年至 1884 年。第二任（第四代）從 1887 年至 1890 年。

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訪書志》敘錄中，曾敘述楊守敬在日本訪書的實況爲「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41]，「所有善本悉以廉價得之，滿載海舶以歸，有屋數十間充棟」[42]，「古鈔舊槧，孤本秘笈，紛集於篋，每得一書，即為考其原委，別紙記之」。[43] 在幫助黎世昌覆刻《古逸叢書》之際，對於無法以金幣購得之日本私人古籍藏書，則以行篋所攜之古今石刻文字與對方交換，達到彼此互易之目的。[44] 楊守敬曾向擔任東京圖書館館長，並曾赴中國遊歷，著有《觀光遊記》的學者岡鹿門（1833－1914）[45]自豪的稱道：余官貴國四年，無涓滴補國，唯為黎公網羅古書，刻《古逸叢書》　二十六種，購得隋唐逸書百餘篋。此外參考古書，撰《日本訪書錄》二十卷，此皆宋元諸儒所未夢見，故雖囊橐索然，不少悔[46]

從以上觀之，楊守敬發揮了他原有的目錄學專長，抓住了當時正值明治維新，朝野一致唾棄舊學的日本社會風潮，從考訂、抄錄、校刊、搜購（交易）、覆刻，他讓散佚在東瀛的大量中國古籍書獲得回流，補足了中國古籍書失佚的遺憾。對近代的中日學術交流做了最貼切的詮釋。楊守敬不但對日本的宋學、古學、考證學等儒學思想領域，甚至對其傳統的醫學研究，都提供了後世中日學者在學術研究上質與量的參考價值，也落實了中日人物、學術、文化、思想交流的深度。在 1893 年赴日考察明治維新的黃慶澄[47] 也對當時日本典藏古籍以及黎世昌、楊守敬在日本的訪書貢獻做了評語。他說：

> 「查東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東中土已佚者，彼國猶珍存之。自西學盛行，此風一變，昔所存者，棄若弁髦。曩閩粵商人，

[41] 《日本訪書志》上，（台北：廣文書局 1956）敘錄。
[42] 同注 41。
[43] 同注 41。
[44] 同注 41。
[45] 岡鹿門（1833－1914），出身日本東北仙台，爲幕末、明治初期的漢學家。名千仞，曾學於昌平黌，在日本關西與松本圭堂開「松岡雙塾」，亦曾爲尊王攘夷運動奔走，明治維新之後經營私塾「綏猶堂」，與晚清思想家王韜曾有密切往來。著有《在意話記》、《尊攘記事》。
[46] 陳捷〈關於《清客筆話》及其價值－日本所藏楊守敬資料解題之一〉，《原學》第五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頁 337。
[47] 黃慶澄，浙江平陽人，經安徽巡撫徐仲復的介紹，以及當時的駐日公使汪鳳藻提供的旅費，於 1893 年 5 月到 7 月到日本考察，寫有《東游日記》敘述他對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觀感。

臺灣大學學術

> 間有購取以歸，而獲重利者。前星使黎蒓齋（世昌）觀察滋任，竭力搜羅，刻《古佚叢書》一部。其時，署中楊君（守敬）亦嗜學好古，遍處采買，得古書甚夥。近我京都琉璃廠書賈，復叠次搜販。于是，市中古書，為之一空。間有一二出售，亦必昂其價值，視為奇貨，而士大夫所藏者尤為珍秘」。[48]

雖然短短兩個月的考察，黃慶澄也觀察出明治初期的日本社會是西風東漸，洋學盛行，嗅出了日本「脫亞入歐」的前兆現象。當時中國古籍在日本的價值雖然一落千丈，閩粵商人有將之取購回流的現象發生，而日本的古籍藏書家卻競相搜購典藏，這種「開國」之初的日本，對東西文化的攝取孰是孰非，整個社會對它衡量的尺度未臻雛形之矛盾現象，確實讓向來以大國自居的中國官僚一時之間無法適應。

楊守敬將他在日本收購或抄錄的古籍書近三萬卷，1884 年他任期屆滿之後，悉數將之運回中國，爲了方便這些書籍的典藏，他蓋了一間藏書室，稱「觀海堂」又稱「飛青閣」。[49] 辛亥武昌起義之際，楊守敬出走，日本人西寺秀武請黎元洪保護其書，1911 年因藏書中之《水經注疏》尚待校定，全書移至上海。[50] 1914 年，楊守敬被召入京參政，藏書亦相繼入京。1915 年楊守敬過世，藏在「觀海堂」的舊藏書有少部分轉讓給民間學者，但大多數被國民黨政府以七萬餘金收買之後，半數藏於北京的松坡圖書館。爾後這些書藏於 1926 年移至北京故宮博物院，再因戰亂 1937 年移至南京、重慶，1949 年隨著國民黨政府轉移到台灣，目前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觀海堂舊本」就是當年楊守敬從日本蒐集的藏書。[51]

（一）、從《清客筆談》看楊守敬與森立之的典籍交流

《清客筆談》是森立之（1807－1885）將自己與楊守敬筆談的

---

[48] 鍾淑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何如璋等：甲午戰爭以前日本遊記五種》，（湖南：岳麓書社出版，1985），頁 349。

[49] 有關楊守敬的「觀海堂」藏書，詳請參閱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台北：漢美圖書公司，1991）。

[50] 楊守敬早年曾七次應試失敗，對仕宦一途曾經斷念，轉而專心寫作，工書、善詩文、精鑑賞金石之學，富收藏。其學問以歷史、地理爲主，特別致力於《水經注》之研究；曾刊行《水經注圖》、《水經注疏要刪》、《歷代地理沿革圖》等。

[51] 《日本訪書志》上，（台北：廣文書局，1956）敘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典藏庫

內容及書簡、留言、借條、邀請函等集結而成的資料集。[52] 森立之是江戶後期至明治初期的考證學者，出身醫生世家。他曾先後事師江戶後期的考證學名家涉江抽齋（1805－1858），狩谷望之（1775－1835），[53]福山藩醫伊澤蘭軒（1777－1829），因此，森立之亦精通本草學及版本目錄學。[54]

《清客筆談》計十卷，除第十卷記述「乙酉」（1882）年姚文棟與森立之商談《經籍訪古志》的排印事宜之外，其餘九卷均爲「辛巳」（1881）年、「壬午」（1882）年間楊守敬與森立之的對談。內容大半爲楊守敬在日本訪書、購書的真實紀錄，另外，還記述第二代駐日公使黎庶昌與森立之的往來書簡，以及森立之與其師涉江抽齋、[55] 伊澤蘭軒（1777－1829）等人共同編撰的《經籍訪古志》相關資料。對於解開楊守敬與森立之的文化交流以及探討漢籍回流中國的真相而言，都是極爲珍貴的原始資料。

《清客筆談》的內容從 1881 年（明治 14）1 月 21 日楊守敬「聞先生精《小學》，收藏古書甚富，特來拜謁」，[56]走訪森立之開始記述。森立之答曰：「今已大半沽卻，珍書不多有。且九世之醫業，

[52] 《清客筆談》原本已失佚。日本學者原田種成曾將鈔本標示訓點，〈清客筆談－楊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筆談〉，《長澤先生古稀紀念圖書學論集》，（東京：三省堂，1973），頁 47－80。據原田氏云：此抄本係野田老於 1949 年（昭和 24）出現之原本抄錄，之後轉送諸橋止軒。原田氏是向諸橋氏借閱後標上訓點的。今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藏有一部珍貴的鈔本。《楊守敬集》第 13 卷，已收錄全文及注釋（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之後，李慶編注的《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亦有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40－74。

[53] 狩谷望之（1775－1835），江戶後期的考證學者。名望之，精於日本古典的本文考證・註解，並傾力於金石文的收集。著有《箋注倭名類聚鈔》、《日本靈異記考證》、《古京遺文》、《本朝度量權衡考》等。楊守敬在日本蒐集的古籍中，原藏於狩谷望之者爲數不少。

[54] 森立之曾參與江戶醫學館編輯《宋板千金方》、《醫心方》的校刊事業。刊行了《神農本草經》，並著有《本草經考注》、《素問考注》等醫書。而他提供給楊守敬的《經籍訪古志》（台灣大學圖書資訊管理系圖書館現藏有善本），即是楊守敬在日本訪書的主要依據。

[55] 涉江抽齋（1805－1858），名全善、字道純。江戶後期的儒學者、中醫師。隨伊澤蘭軒學醫術，儒學則拜市野迷庵・狩谷掖齋爲師。是當代知名的考證學家。與森立之共撰《經籍訪古志》，並著有《黃帝內經靈樞講義》。日本近代文學家森歐外曾做《抽齋傳記》描述其履歷、性格及其交友情形，並曾在 1916 年的〈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連載。

[56] 李慶編注〈《清客筆談》－楊守敬和森立之〉，《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40。

臺灣大學 期刊資料庫

故經史類尤少。七十五年之今日，子孫共無，不得已而為貧乏小官是務」。[57] 森立之爲醫師世家，之後他影響了楊守敬獲得許多日本古籍醫書，森立之與楊守敬見面時已經七十五歲，他所謂的「小官」是因他任職日本大藏省印刷局，主要以編輯爲務，晚年的經濟狀況並不如意。森立之雖然說所藏的經史類很少，但楊守敬開門見山向他探尋的卻是在日本古代曾經廣被利用的《玉篇》、《廣韻》及《太平御覽》等宋、元古籍。從筆者整理的「楊守敬訪書過程摘要」中可得知楊守敬攜回了《玉篇》殘本四卷（表第 10）、《大廣益會玉篇》三十篇（含北宋槧本一部、元刊本一部、明刊本一部＝表第 11、12、13），以及四部《廣韻》五卷（含北宋刊本一部、元刊本一部、明刊本兩部＝表第 14、15、16、17）。這些文獻並非垂手可得，其間過程之艱辛在《日本訪書志》的紀錄中隨處可見。例如楊守敬欲重刻《廣韻》五卷（北宋刊本），多次請求駐日公使黎世昌協助仍未能如願，最後以自己所藏的數種漢印譜與原藏者交易才得以重刻。又如《玉篇》殘本四卷，因所藏者分散，欲完全重刻得四處搜尋，費時、費事，楊守敬在日訪書期間，森立之居中穿針引線，提供了楊守敬了解日本江戶時代考證學與書誌學研究的廣泛資訊。

楊守敬曾說：「得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抄本，其時立之尚存，乃按目索之，其能購者，不惜重值。」[58] 在《日本訪書志序》也提到：「交其國醫員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按錄索之」。[59] 足見森立之在楊守敬訪書的過程中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另外，當時在日本修史館擔任監事的巖谷修，以及經常陪楊守敬出入訪書的藏書家寺田弘等人也在《日本訪書志》中經常出現，他們都是楊守敬在曾經密切交往的日本文人。

從《清客筆談》看得到的範圍內，楊守敬與日本藏書家們洽談、商借，甚至交易的古籍書計有：舊版《左傳》、嘉靖版《左傳》、《太平御覽》喜多村刻本、官版《廣韻》、《開萬藏書目錄》、《水經注》、《玉燭寶典》、《太素經》、《本草經考注》、《大觀本草》、《三國志》、

[57] 同注 56。
[58] 〈鄰蘇老人年譜〉，《楊守敬集》第一卷，（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59] 《日本訪書志》上，序文（台北：廣文書局，19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籍訪古志》、古抄本《魏武注孫子》、《篋中集》、《秘府略》、《戰國策》、《拾遺記》、《孟子》、《汗簡》、《廣雅疏証》、《集韻》、《神農草本》、《醫籍考》八十卷（未刊）、《易正義》、《穀梁傳》、《古文孝經》、《淮南子》、《淮南子纂評》、《書錄解題》、《文字蒙求》、《諧聲圖》、《說文新附考》、《段注說文》、《戴氏叢書》、《爾雅》、《荀子遺秉》、《荀子補注》、《孝經直解》、《見在書目》、《王充論衡校異》、《五行大義》、《記事本末》、《經子考証》、《周易音訓》、《兵車考》、《皇疏》、《弘決外典鈔》、《玉臺新咏》、《物理論》等。其中如《玉篇》、《廣韻》兩部，森立之開價百圓，楊氏還是忍痛購入。至於《三國志》開價二十圓，楊氏以十圓成交，《易正義》開價八圓，以六圓購得。[60] 據實藤惠秀研究指出，明治初期在日本的漢籍價格高昂，明治十四年（1881）由大阪「修道館」出版的《資治通鑑》一部索價六十圓。而當時東京鬧區神保町駿河臺附近一千坪的土地才值二十五圓。[61] 森立之曾經告訴楊守敬：「尋常一般書，攜千金上市則十車可得。吾輩所好皆是上世遺篇，有一無二者許多，故與世上一般之書，其論不同日也」[62] 當時日本人藏書家重視珍本漢籍的程度，以及它的價值超乎常人想像。不過，楊守敬購書亦有備而來。他向森立之說：「僕與廣東黃君約以二千兩銀來，在此買書買板，所關甚大」，[63] 以金錢可購者，楊守敬頗有「雖千金吾往矣」之氣慨。

（二）、從《日本訪書志》看楊守敬訪書的方法與過程

《日本訪書志》全書十六卷，共收楊守敬在日期間搜訪、抄補之古籍舊本二百三十一篇。本文因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詳述。以下據清光緒 23 年（1897）年刊本，就相關文獻，摘記楊守敬訪書之過程，以分析古籍的出處及楊氏與日本藏書家的交流。（為便於敘述，請參照筆者整理之「楊守敬日本訪書過程一覽」表）

---

[60] 李慶編注〈《清客筆談》－楊守敬和森立之〉，《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49、52、53。

[61] 陳固亭譯《明治時代中日文化的連繫》中譯本，（實藤惠秀原著《明治日支文化交涉史》），（台北：台灣書局，1971）頁 94－95。

[62] 李慶編注〈《清客筆談》－楊守敬和森立之〉，《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54。

[63] 同注 62，頁 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的序文中提到：「（古籍）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幣得」[64]，因此他搜書非完全以金錢可得。他說：「所攜古金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見者，彼此交易，於是其國著錄之書麇集於篋中」，[65] 又說：「幸所攜魏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見，又古錢、古印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無，遂盈笥篋」，[66] 楊守敬搜訪古籍，非金錢可得者，或以古金石文字，或用中國古代碑版、古錢、古印交易，可謂不達目的決不終止，其窮日夜之力，補鈔、刻書，積極好古的精神可窺一班。例如楊守敬從《經籍訪古志》得知宋刻本《太平寰宇記》殘本（表第 41）藏於楓山官庫（紅葉山文庫）[67]之後，因思此宋刊本已經失佚，欲將之重刊，以補中國古籍之不足；但此珍本極難借出，乃託日本修史館監事巖谷修告知相關資訊，並請黎世昌商洽當時日本的太政大臣三條實美[68] 始得借出二十五冊，楊守敬重刊後將之刻入《古逸叢書》。楊守敬云：「（《太平寰宇記》）雖尚佚其兩卷有半，未為全書，亦足以慰好古之懷矣」。[69] 楊守敬愉悅之情，表露無遺。此外，楊守敬從森立之處得知《春秋左傳集解》三十卷之六朝遺本（表第 24），藏於楓山官庫，不易出借，遂商請巖谷修協助。因是珍本，巖谷無法做主，楊守敬云：「貴國有如此奇書韞櫝而藏，如何假吾傳錄於西土，使海內學者得覩隋唐之遺，不尤貴國之光乎」，[70] 巖谷久思許久才答應出借，而時間僅給楊守敬十天。錄畢，楊守敬復云：「此書山井鼎所未見，蓋山井鼎為足利士族，足利學所藏古鈔本無《左傳》，故考文只有興國本及活字本而無古本。楓山官庫在京師，非彼列侯之士所得寓目也。余乃從

[64] 《日本訪書志》上，序文（台北：廣文書局，1956）。
[65] 同注 64。
[66] 〈鄰蘇老人年譜〉，《楊守敬集》第一卷，（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67] 「紅葉山文庫」爲江戶幕府將軍的文庫，其藏書大半存於國立公文書館的「內閣文庫」及「宮內廳書陵部」，有關漢籍書的收藏情形可由《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御文庫目錄》窺知個別漢籍書的資料。紅葉山文庫收藏的中國地方志大部分是在德川吉宗的時代傳到日本。而這些地方志都是在康熙及乾隆時代編撰的。根據長崎市立博物館的「經堂文書」記載，在當時輸入日本的漢籍書就有 65 種之多，這些都是御用之書。
[68] 三條實美（1837－1891）爲幕末、明治期的公爵、政治家。是日本率先支持尊王攘夷運動的政治家之一。明治維新之後任太政大臣。
[69] 《日本訪書志》上，（台北：廣文書局，1956），頁 362。
[70] 同注 69，頁 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百年後得見彼國學者未見之書，不可謂非厚幸乎」。[71] 楊氏慶幸自己得錄此珍書，爲百年難得一見之雅事。

有關楊守敬與狩谷望之的交往，他曾向森立之說：「頃購得《經籍訪古志》，知先生為狩谷高足。敬于貴邦最服膺狩谷氏，以為第一流。」[72] 這裡提到的狩谷，即是日本江戶末期忠實於清朝考證學的藏書家狩谷望之（1775－1835），爲森立之的師匠之一，亦是當時受到清朝學風影響極深的知名學者。他把自己的書房取名爲「實事求是屋」，是引自顧炎武「實事求是」一語，其求古藏秘本爲日本之冠。[73] 狩谷與另一位專門研究漢唐注疏的松崎慊堂（1771－1844）並稱爲日本考證學之創導人。森立之對日本古籍的收藏情況能有深入的了解，大都是受教於狩谷望之之故。楊守敬攜回或重刻的古籍當中，《類聚名義鈔》十冊（表第 5）、《爾雅注》三卷（表第 7）、《大廣益會玉篇、元刊本》三十篇（表第 12）、《周易正義》十四卷（表第 19）、《貞觀政要》十卷（表第 39）都是原來狩谷望之的舊藏書。凡此艱辛的訪書經緯，楊守敬在其《日本訪書志》中，記載歷歷。

楊守敬爲訪書之便，曾主動表示將爲森立之重刊《經籍訪古志》。楊守敬說：「觀先生《訪古志》，知於古書源流真僞辨別精宙，弟近日欲刻此書，但此書中抄寫頗有訛字，不敢確臆定，願先生校而後刻之」，[74] 又說：「狩谷書，弟謹見《古京遺文》，亦欲刻之。又貴邦古書為我國所佚者，如《姓解》、《史略》、《玉篇》殘本、《玉燭寶典》皆欲刻之。有煩先生為校刊」，[75] 藉此，楊守敬一則表明訪書的意義及其重要性。二則以示尊重並取信於森立之。重刊《經籍訪古志》一事，森立之說：「《訪古志》上木之事，僕之宿志也。只奈家貧而不能，且助其資者亦無有，荏苒至於今日也。若刻成，則再三加校正，則僕之所願也」。[76]楊守敬得到森立之相當正面的回應。

---

[71] 同注 69，頁 41。
[72] 李慶編注〈《清客筆談》－楊守敬和森立之〉，《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42。
[73] 鄭彭年《日本中國文化攝取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 265。
[74] 同注 72，頁 43。
[75] 同注 73。
[76] 同注 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守敬日本訪書過程摘記一覽

古籍書名		訪書過程摘記
1	論語集解十卷（古鈔卷子改摺本，分為四冊）	此書不見於森立之《訪古志》，得自小島尚質（1797－1847）之舊藏。
2	《監本論語集解》二卷（宋刊本）	楊守敬將此書攜回中國之後，有海寧章君不惜重金力求購買，楊守敬不從。後與章君約訂將此本重刻餉世。
3	《論語集解》十卷（日本正平甲辰（1364）年刊本日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	據市野光彥云，此書乃足利氏之後裔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之刊本，由黎世昌訪得。市野光彥曾於文化年間（十九世紀初期）據此本翻刻。又日本藏書家古健之致亦曾印行。
4	唐元宋開元注孝經一卷	享祿卷子本，寬正十二年（1880）摹刊。已刊入《古逸叢書》中。此書為開元十年初注本
5	類聚名義鈔十冊（舊鈔本）	此本為狩谷望之舊藏影鈔本。（此書無撰人姓名，亦無年月，其原本不知）
6	爾雅注三卷（影鈔蜀大字本）	據松崎明復云：此書乃日本室町氏所刻，原本今尚存東京高階氏。日本僅存此一本。
7	爾雅注三卷（重翻北宋本）	此書原本為日本大醫某所藏，狩谷望之借之精摹而松崎明復（又稱松崎慊堂 1771－1844）據以重刊。
8	漢隸字源殘本（有圖）	狩谷望之求古樓舊藏《訪書志》所稱元槧未見者即此本。
9	金薤琳琅二十卷（鈔本）	每卷有王鴻緒印，知是橫雲山人舊藏，但未知何時流入日本。又有備前河本氏藏書記，此人亦日本有明之收藏家。
10	玉篇殘本四卷	刻入《古逸叢書》，日本印刷局長得能良介從西京高山寺借得系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又據以重鐫而系部始為完璧四卷。
11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篇	（北宋槧本）
12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篇（元刊本）	此本卷首有狩谷望之印
13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篇	（元刊本）楊守敬另存元刊本三部，明刊本一部
14	廣韻五卷（北宋刊本）	刻入《古逸叢書》此本原為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後歸町田久成藏。楊守敬多次會黎世昌欲重刻之，皆未得。後楊守敬以所藏漢印譜數種交易而成。以西法影照。
15	廣韻五卷	（元刊本）楊守敬另存元刊本、元槧本各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	廣韻五卷明刊本	此本楊守敬所得舊本《廣韻》之第六冊，為日本人寺田弘所藏，有「讀杜草堂」印記。
17	廣韻五卷明刊本	此本戲劇宋之本重翻者。每卷有釋意秀印。第一冊有多記事印。多記亦稱月丹波元堅，字芷庭三世為醫，博通典藉，收藏極富。
18	足利活字本七經（山井 鼎藏）	印行於日本慶長年間（17 世紀初期）係據日本古鈔本及參校宋本完成。 七經者自慶長始有活字本，楊守敬積四年之久才搜購齊全
19	《周易正義》十四卷（舊抄本）	狩谷望之藏無年月，為弘治、永祿（16 世紀中期）年間之鈔本。
20	《伊川易解》六卷《繫辭精義》二卷	刻入《古逸叢書》，元至六年（1865）「積德書堂」刊本，為重翻宋本。
21	尚書正義二十卷（北宋槧本）	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原本今藏楓山官庫（楓葉山文庫）
22	尚書注疏二十卷（宋槧本）	此宋槧經書為海內孤本，楊守敬多次往還京都、大阪，經四次議價於日本收藏家才得收購、楊守敬云：此書凡十冊，原缺二冊，楊守敬將之鈔補完成。
23	尚書釋音二卷	影宋本刻入《古逸叢書》。
24	春秋左傳集解三十卷（古鈔卷子本）	此本為六朝遺本，非唐宋本，現藏楓山官庫（楓葉山文庫），此本乃楊守敬訪日本之書記官巖谷修、森立之等人士，經多次洽商之後始得借出。三十卷借出，時間僅限十天。每卷有金澤文庫印；卷後有建長八年（1256）參河守清原、建保三年（1215）清原仲光，文永五年（1268）音博士清原等校刊。
25	春秋左氏傳殘卷（石山寺藏本舊鈔卷子本）	癸未（1883）春，轉借自日本印刷局。楊守敬云：因別有詳本校，故僅錄其最異者之部分經文。
26	春秋左傳三十卷（舊鈔本）	此本除第三十卷外，不載經文。
27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覆宋本）	此本從森立之處得之。但經楊守敬與楓山官庫所藏之興國本校對之後，推翻了森立之指其為北宋本之說 又此書有森立之之跋，稱此書先後為日本舊藏家市野光彥、渋江道純（森立之之師）所有。又按市野光彥跋得知狩谷望之亦藏一本，楊守敬兩本皆得。
28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宋刊本刻入《古逸叢書》）	此書原本舊為日本學士柴邦彥所藏，文政間（十九世紀初期）使人影摹。楊守敬乃從日本人向山黃村處求得。原建議何如璋重繙；不果。第二任駐日公使黎世昌允許付梓。
29	集韻十卷（宋刊本）	缺首卷，為楓山官庫藏本，乃楊守敬從修史官巖谷修借出，使日本人高根虎松以曹刻本校過而手摹者。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30	韻鏡一卷，日本舊刻本	刊入《古逸叢書》，此本日本人清原宜賢於享祿戊子（1709）年據各傳鈔本重刻者。
31	一切經音義一百卷	日本藏高麗藏本，此本為有島田蕃根贈楊氏者，楊守敬稱中國已無此本。
32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日本古鈔本，此本原為日本浪速（今大阪）井上氏所藏。此本為楊守敬於癸未（1883）年嘉平月十四日，商洽日本印刷局長町田久成使得見成者。楊氏原擬全部影鈔，因歸還期限迫切，僅摹部分款式入《留真譜》，然楊氏仍耿耿於心，未能釋懷。
33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宋槧本，楊守敬得此本後，即屬高根虎松以明南藏本校對異同。
34	篆隸萬象名義三十卷	（舊鈔本）此本為狩谷掖齋（望之）所藏。
35	新撰字鏡十二卷	影古鈔本，此本為日本僧昌住撰。楊守敬得五卷（一、四、五、六、七卷），甚表驚喜。經訪森立之及町田久成後得知日本人鈴鹿氏藏二、四兩冊，餘十冊為浪速（今大阪）井上氏所藏。經町田氏勸後兩家藏書納入博物館後，始為全書。每卷有法隆寺印。卷首末有天治元年甲辰（1124）五月下旬之書記。楊守敬為所得古鈔本多有此印。
36	弘決外典鈔四卷	寶永丁亥（1707）年刻本。日本村上天皇子具平親王撰。
37	淨土三部經音義四卷	（舊鈔本）日本嘉禎三年（1237）沙門信瑞撰。
38	國語補音一卷	此本為渋江道純舊藏，楊守敬從森立之處得之。
39	貞觀政要十卷古鈔本	此本為狩谷望之求古樓所載缺前二卷，楊守敬將此本與森立之的《經籍訪古志》交相對照後稱吻合。又第三卷以下每卷有文化六年（1809）六月之記。
40	貞觀政要十卷舊鈔本	此本係文政元（1818）年阿波介藤參照日本各古本合校者。又此本每卷有松田本生及向山黃村之印。楊守敬從向山黃村處得此本，而日本古本異同皆彙集無遺。
41	太平寰宇記殘本宋刻本	此書之宋刊本久已失佚。楊守敬依森立之的《經籍訪古志》得知此書宋槧殘本，藏於楓山官庫，因思此書有補中國所佚，乃託日本修史館監事巖谷修探之，並請黎世昌商洽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借出，凡書二十五冊，為蝴蝶裝，所存者不及一半。楊守敬重刊之後刻入《古逸叢書》。接楊守敬云：此書尚缺兩卷半，並未成全書，但足以慰好古之懷。
42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宋藏經刊本）	此書楊守敬曾得鈔本隨函錄三十卷。此本第一、六兩卷原缺。日本元祿九年（1696）山域卅天安寺法金鋼院重修此書，乃從別本影鈔補此兩卷。此本亦同宋本。
43	莊子郭注殘本三卷（古鈔卷子本）	據森立之的《經籍訪古志》云，《莊子》舊鈔卷子本為十五卷。此本為小島學古入京展閱後傳錄了雜篇「庚桑」第二十三、「外物」第二十六，「寓言」第二十七凡三卷。據楊守敬校對指出此本誤鈔之處不少，是依李唐舊本傳錄。

資料來源：楊守敬《書目叢編，日本訪書志》（廣文書局、1981）

期刊資料庫

（三）、楊守敬與日本古籍醫學書

在此，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楊守敬在日本收購的古籍書當中，有關醫學的書籍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除了他交的往對象森立之本身是醫生以外，在日本幕末撰研考證學及書誌學的人物，泰半都是醫生，而且從事《經籍訪古志》的編輯者大部分也都是醫生。基本上，楊守敬以《經籍訪古志》的記載察訪日本的古籍書，因此他大量收集醫學書是不難理解的。據真柳誠的調查研究指出，目前在台灣所藏的日本古籍醫學書計有 1,538 點，其中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810 點，國家圖書館 648 點，中央研究院圖書館 64 點，台灣大學圖書館 14 點，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2 點。真柳誠指出台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日本古籍醫學書約有 400 點，而他調查過的 330 點幾乎都是楊守敬「觀海堂」的舊藏醫學書，這些醫學書就是明治初期楊氏在日本收購的。楊氏的醫學古籍之購書來源除了上述的森立之等人之外，曾任德川幕府醫官的小島尚質（1797－1847）・尚真（1829～57）・尚絅（1839～80）的小島家、江戶醫學館多紀家，以及奈須恒德・渋江抽齋・伊澤家・山田業廣等日本醫界人物。[77] 楊守敬在日本訪購的古籍醫學書，對中國最大的貢獻在於他以日本覆刻的宋本《傷寒論》爲底本，編寫了《傷寒論》並將他編入武昌醫館刊行的《武昌醫學館叢書》（全八種），同時在中國出版了《聿修堂醫學叢書》，楊守敬是將日本人的傳統醫學研究成果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的第一人物。[78] 至於楊守敬交往過的小島尚質（1797－1847）原爲幕府醫官，字學古，號寶素。後因喜愛收集中國古籍書而聞名。在《國書總目錄》中載有《小島寶素目録》。其藏書以「小島氏圖書記」或「博愛堂記」印，又因其書齋稱「攷古斎」或「寶素堂」，其抄本的稿紙均記有「攷古斎鈔本」、「寶素堂鈔本」字樣。楊守敬曾案此目錄收購了小島尚質的所有藏書及著作並帶回中國，故其藏書在日本已近消失。曾任日本軍醫署官員，後來也成爲日本近代文學家的森歐外（1862－1922）在 1917 年編寫《小島寶

[77] 真柳誠〈台湾故宮所蔵の日本関連古医籍〉《日本医史学雑誌》47 巻 3 号，2001，頁 544-545。

[78] 李慶編注〈《清客筆談》－楊守敬和森立之〉，《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素傳》時，除了小島家的家系資料之外，在日本幾乎找不到相關的醫學傳記資料，因爲當時都給楊守敬帶回中國，因此以後若要編寫《小島寶素續傳》，非根據台湾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小島家舊蔵文献加以考證不可。[79]

六、結語

針對上文的論述，提出以下五點小結，以就教於學界。

（1）、何如璋、黎世昌雖爲晚清第一、第二代駐日公使，他們對當時中日之間發生的朝鮮問題、琉球問題，並無法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原因是這些重要的政治、外交的問題都由晚清的北京高層直接處裡，他們所得到的授權有限，再則，兩位都是飽學經詩的中國傳統儒士，對外交的事務的處理亦談不上專業，因而轉移了外交事務的排序，將文化交流列爲對日關係極重要的一環。何如璋爲了琉球藩屬問題與當時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1832－1893）交涉的過程就不得要領，而陷入外交困境，最後雖由李鴻章請前美國總統格蘭特（General Grant）將軍居中調停，亦不得要領，結果直到中日甲午戰爭爲止，琉球藩屬問題上無法解決。就此問題，駐日公使館並非毫無對策及建言，主導晚清外交事務的李鴻章對當時日本情勢的誤判，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何如璋從《使東述略》介紹了當時的日本國情，糾正了所謂的「日本三島」即是日本的說法，我們可以說晚清以前的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都是踏襲前人，依文獻所流傳的日本觀，不切實際，流於形式者多，晚清一般知識分子欠缺對日本的具體認識，這是無庸置疑的。換言之，晚清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當中，真正思考有必要做深入調查的時間點是在朝鮮問題、琉球問題及「台灣出兵」等雙方激化對立，衝突浮現之後。另外，他們並未察覺日本幕末到明治初期持續發酵的尊王攘夷運動、自由民權運動等國家發展，以及醞釀「脫亞入歐」的社會風潮。嚴格的說，何如璋、黎世昌兩位駐日公使對上述中日雙方

[79] 同注 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政治、外交重要議題之爭論並無建樹，但是他們開拓了晚清認識日本的管道，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就如鈴木智夫之論述般，何如璋等人以外交官的身分駐在日本，本爲解決民族危機問題而來，故經常要摸索「救國之道」，因此，他們心中都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民族情感，而這種情感，遠非身處晚清高層的洋務派大官們所能看得見或體會得到的。[80]

（3）、明治初期的日本社會是西風東漸，洋學盛行，至少他們嗅出了日本即將「脫亞入歐」的前兆現象。另外，當時中國古籍在日本的價值雖然一落千丈，閩粵商人有將之取購回流的現象發生，而日本的古籍藏書家卻競相搜購典藏，這種「開國」之初的日本，對東西文化的攝取孰是孰非，整個日本社會對它衡量的尺度未臻雛形之矛盾現象，確實讓向來以大國自居的中國官僚一時之間無法適應。不過，就前述何如璋的對日觀而言，他的外交思想仍脫離不了「中體西用」的思維模式。

（4）、楊守敬藉駐日使館之便，發揮了原有的目錄學專長，抓住了當時正值明治維新，朝野一致唾棄東洋舊學的日本社會風潮，從考訂、抄錄、校刊、搜購（交易）、覆刻，他讓散佚在東瀛的大量中國古籍書獲得回流，補足了中國古籍書失佚的遺憾。對近代的中日學術交流做了最貼切的詮釋。楊守敬不但對日本的宋學、古學、考證學等儒學思想領域，甚至對其傳統的醫學研究，都提供了後世中日學者在學術研究上質與量的參考價值，也落實了中日人物、學術、文化、思想交流的歷史意義。

（5）、《清客筆談》紀錄楊守敬與森立之的對談，內容爲楊守敬在日本訪書、購書的真實紀錄。此外，還記述第二代駐日公使黎庶昌與森立之的往來書簡，以及森立之與其師匠涉江抽齋（1805－1858）、伊澤蘭軒（1777－1829）等人共同編撰的《經籍訪古志》相關資料。對於解

[80] 鈴木智夫〈中国における国權主義的外交論の成立～初代駐日公使何如璋の活動を中心に〉，《歷史学研究》第 404 號(東京：青木書局, 1974)，頁 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開黎庶昌、楊守敬與森立之的典籍交流以及探討漢籍回流中國的真相而言，不得不說它是極爲珍貴的原始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